

# 条约口岸社会史的 认知视角与方法

——评忻平著《从上海发现历史》

杨 天 宏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系,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忻平教授《从上海发现历史》一书力图建立一个研究上海这类近代条约口岸城市社会史的新模式。该书响应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观念,同时借用余英时阐释的自魏晋以来儒、释、道三教均一直存在的与商品经济相吻合的“入世”倾向,以及儒家“教义”由原始的生成形态向经世致用、义利并重转化的理论,认为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能够适应现代化的“内在基因”,上海近代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在于此。但作者关于上海基本上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背井离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传统观念的背离”的论述却并不支持这一理论。尽管如此,忻平著作注重事实重建的完整性,对于近代城市社会史研究的贡献仍然是实质性的。

**关键词:**忻平;上海;社会史;视角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3-0097-05

在中国史学界受大洋彼岸的学术影响,开始疏离费正清的“挑战——应战”模式,改以柯文提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新观念认知中国自身历史时,忻平教授的著作《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sup>①</sup>出版了。从书名上看,忻平象是在响应柯文(Paul Cohen)。但是,细读其大作,则可发现,忻平并非简单地套用柯文的模式,他的深层用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乃是要在“从上海发现历史”的大前提下,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的探索,“获取开启现代中国历史之门的钥匙”。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是在向费正清模式提出更深层次的挑战。因为按照一些学者的理解,费正清模式尽管有西方文化中心论之嫌疑,难以说明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变化,但用来解释发生在沿海“条约口岸”的变化则是差强人意的。

忻平以一种必欲将“新理论”贯彻到底的精神,认为即便在上海这样的条约口岸,费正清的解析模式也未必适用。以下这段论述,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思想:

尽管上海崛起与发展的初始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国外,上海的历史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离开中国社会的内部动力与中国人的现代化努力,上海的发展与繁荣是不可想象的。……外国势力的渗入,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与速率,却未中断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自然历程”。在新的时空条件下过去受压抑的某些内部要素的激活,与本土现代经济力的发展和新的价值理性,构成上海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取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型动力。[1](30页)

这段类似全书主题的陈述同时包含了方法论的

收稿日期:2003-02-10

作者简介:杨天宏(1951—),男,四川省成都市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

含义。不难看出,尽管忻平有时也承认外力的作用,但他在说明上海近代社会历史发展时,思想视线的聚焦点是在上海“内部”,这与费正清在研究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社会近代变化时所选取的路径是截然不同的。在作出这一重要陈述时,忻平引述了柯文的见解:“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仍然是中国的。”即使是上海这个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口岸城市,这条奇妙的中国“剧情主线”仍然“没有被西方抢占或替代,它仍然是贯穿19乃至20世纪的一条最重要的中心线索”。忻平认为,尽管近代初期上海还缺乏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但是经过几十年“依靠引进现代要素”的积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内在的追求已有在很大程度上发展成为主要的社会动力的取向”[1](31页)。由此,忻平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由内及外的上海近代历史发展的诠释模式。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新模式所隐含的理论挑战至多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忻平以其学术慧眼,敏锐地察觉了费正清理论中概念的不周延,企图用一种截然相反的理论模式来取代它。这种在学术理论上刻意创新的精神,为中国学人所缺乏,因而弥足珍贵。然而,他似乎忽略了,一种不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模式未必就具有普遍的“不适性”。换言之,一种用来解释整个中国近代历史难奏其功的理论模式,未必就不能用来解释某一特定区域近代历史的发展。费正清模式的缺陷在于,他将发生在条约口岸的变化及其原因,推而广之,用来说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他没有注意到,多少带有畸变特征且空间范围极其有限的条约口岸这一社会细胞,并不能放大还原为近代中国庞大的社会有机体。但是,费正清对包括上海在内的早期条约口岸的研究,无论从文献学的角度,抑或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审视,应该说都是卓越的<sup>②</sup>。考虑到这层因素,恐怕尚不能轻易宣称,费正清的模式已经完全过时。

揆诸事实,我们看到,尽管强调传统,但在忻平著作所讨论的时间范围内,上海人的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早已经不是“传统”而是“现代”的了。“现代”这个外来词汇曾经被音译为“摩登”。在近代不同区域的国人当中,上海人最讲究“摩登”。30年代刊登在《申报》上的一篇文章曾以“有物皆‘摩’,无事不‘登’”[2]来形容上海人的社会生活。由于欧风美雨的吹拂浸润,上海人的传统观念益渐淡薄,不

少人连民族固有的喜庆节日也不过了,每逢圣诞、复活节之夜,则与洋人一道,举杯相庆。以上海著名的工商巨子刘鸿生为例。1933年4月,他偕夫人及女儿回定海、宁波祭扫祖坟,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扫墓时间应定在清明这一天。但刘鸿生却依西俗,决定在“Good Friday”即耶稣受难日去扫墓,只是因宋子文在这一天约以要事,才不得不改期。其实,不仅是刘鸿生这样的工商人士,就是像王韬这类传统士绅,“一旦他来到上海,并开始为伦敦布道会工作,‘绅士’的头衔很快成为过去”。与王韬一样具有功名的士绅李善兰、华衡芳、蔡文康、韩子云及稍后的李伯元、包天笑等,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进入华洋混处的上海之后,价值观念亦发生变化,不再被视为传统士绅的成员……。这样的历史事实,是我们从忻平著作中不经意地拾掇到的。忻平欲再现近代上海人的社会生活,故不忍割舍如此具有“摩登”色彩的史料。然而,这些史料,若用来证明费正清模式的合理性,即证明上海社会的近代性变化主要是在西方文明的作用之下发生的,似乎更加有效。

决定上海历史从何处去“发现”的关键是近代上海的人口构成。在这一研究领域,目前已有张开敏的《上海人口迁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和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论著可资参考。开埠前,上海的人口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的460余年间,人口从30余万增长为52.4万,增幅仅76%,年均增长只有1.2%[3](26页)。开埠后,上海人口迅猛增长,到1949年100余年间,其人口已猛增至545万,增长10.4倍,平均每年增幅高达10%左右。就人口构成而言,上海的“土著”居民为全部居民数的20%左右,具有明显的“客籍多于土著”[4](304页)的特征。虽然移民来自不同的地域,有着驳杂的迁徙动机,但这些人“对其本乡本土的索然枯燥、缺乏机会的现状最为敏感”,渴望寻找具有更好的生存条件或能够更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域或场所则是共同的。忻平按照乐正的粗疏分类,将近代上海移民划为“主动移民”和“被动移民”两类,然后根据马克思资本驱动力作用的理论以及K. J. 巴顿《城市经济学》的原理,得出如下结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于那些主动型移民来言,能否背井离乡也正是检验他们对传统观念的背离度。”[1](52—53页)人口的区域

及社会流动乃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忻平对上海近代移民所作定量和定性的研究,充分吸收了前人的成果,而又不囿成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将移民为主体的上海近代文明的“载体与动力”作了具体分析,以上海人的社会生活为基本内容的上海近代社会史研究也就被置于一个相对坚实的基础之上。

然而,问题也正好从这里产生。忻平非常重视上海人“内在的追求”,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沪埠近代发展“主要的社会动力”。他的著作开篇便借用余英时所阐释的,自魏晋以来儒、释、道三教均一直存在的与商品经济相吻合的“入世”倾向,以及儒家“教义”由原始的生成形态向经世致用、义利并重转化的理论,认为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能够适应现代化的“内在基因”。余英时的论述系针对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传统儒教缺乏基督新教伦理中有利资本主义发展的“入世”倾向的理论而发。是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入世”倾向已构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进而言之,讨论中国传统社会何以没有像西欧及北美那样发展成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否一定要循着韦伯经由宗教伦理精神特征去探寻的思路?这应该还有讨论的余地,因已逸出本文的讨论范围,容付阙如。退一步言,即便余氏的见解系不刊之论,一旦被忻平用作立论的“理论”依据,也可能与他自己关于上海移民的分析形成悖论:既然上海的人口构成是以外来移民为主,按照忻平自己的说法,移民又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传统观念,而“现代观念”又基本上是从西方泊来的,即便是少数恪守中国传统的移民,他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也不一定与“土著”沪人相同,那研究者又如何能够“从上海发现历史”,即从上海自身的历史传统中找寻到现代发展的动力呢?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不承认,忻平对学术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是实质性的。因为他将综合性的社会史研究,引入上海这样的中国近代城市,既拓展了社会史研究的适用范围,又丰富了方兴未艾的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内容。“社会史”的概念是上个世纪20年代由法国年鉴学派提出来的,但它在中国并非纯粹的“泊来货”。曩者司马迁作《史记》,内有“滑稽列传”,记述那些言非若是、说是若非的“辨捷之人”如淳于髡、西门豹者流之事迹,就颇有些“社会史”的意味[5](卷一百二十六,3197—3214页)。然而,正如梁启超批评的那样,中国的传统史学,基本上是记载

帝王将相事迹的王朝兴衰史。那些“琐细”的社会生活,微观也罢,“中观”也罢,虽为稗官看重,却鲜为史家留意。近代“新史学”在中国兴起之后,社会史开始受到学者关注,然却多所误指。如30年代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实则为“社会发展史”的论战。一些悉其内涵的学者,大力倡导研究社会史,却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治“正史”的需要。钱穆所谓“欲治中国之政治史,必须通中国之社会史”[6](203页),虽旨在循由血统而政统而道统之理路,探究两者的关系,盖亦有主辅之辨在焉。三四十年代由于学者们的努力,产生了一大批较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著作,如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等,但是社会史一向所处远离史家关注中心的“边缘”地位,并无大的改变。

3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始复苏,并逐渐在史学的殿堂内占据一席之地。但也许是过于看重传统农业国的地位,此时的社会史著作大多以农村作为研究对象。这期间虽出现了少许剖析近代城市社会生活的著作,如赵园的《北京:城与人》、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等,但一般只是摄取城市社会生活的某一断面,算不上是综合性的近代城市社会史研究。忻平的著作虽然也有某些主观预设的时空限定,但它毕竟较为广泛地展示了作为沪中社会生活主体的上海人——它的外来移民、人口构成、职业状况、性格特征、价值取向、工资收入、消费特征、文化生活、风俗及其变异、方言、民居等社会生活画面,对于人们习惯于称之为“负面”存在的犯罪现象,社会心理变态,以及帮会、乞丐、娼妓等,亦能予以一定的关注。在这里,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范围的广狭差异,而且可以看到某种“印证”似的研究功效。一些过去孤立地加以探讨而难以知其究竟的现象,一旦被置于具有相互联系的网络体系之中,其内涵及缘由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例如风俗的流变、方言的异化,离开了移民这一因素,将难得其解。但在一种同时具备了这两方面内容的研究体系中,即便研究者不作申明,读者也可轻易地发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方法上,忻平的著作也颇具特色。前些年,“结构主义”盛行,史学研究因之离却皮相,此其功德。然而,结构主义类似庖丁解牛仅“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标榜“未尝见全牛”的方法,未必是历史研

究的经久法门。目前,西方学术界正在经历的由抽象的结构解析向注重具体事件描述的传统史学回归的现象,殊耐寻味。作为“海派”学人,忻平没有趋赶“结构主义”的理论时髦,而是更加注重通过事实描绘来“再现”历史。他把这种旨在“还原其本来面目”,使社会生活画面具有“逼真性、立体感”的研究方法称作“全息史观”。其命意显然是要像全息摄影那样,将与上海人的近代社会生活史相关的全部信息都摄取并再现出来。忻平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构想,读者径读其书,便可得出判断。惟其不盲目趋赶时尚,我行我素,在方法上却走到了一种或者又将被谬赞为“后现代”的境地,其中的义蕴,足以让那些在理论方法上没有安身立命之所,一味仿效西人的学者寻思。

忻平著作的另一值得称道之处是不“媚俗”。社会史研究与其他部类的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应当是严肃的。但近年来却出现了某种庸俗化的倾向。一些号称“社会史”的著作对属于社会病症的赌博、黑道、贩毒吸毒、青楼女子、暴力行为的“客观描述”,已经到了让人怀疑“社会史”研究的价值程度。忻平没有回避这些社会现象,但却不事渲染,他的着眼点是对这些社会现象作社会心理学和病理学的分析,为诊治某些一直贻害至今的社会疾患提供药石与方剂。例如该书第六章援引沈从文对作家张资平的批评,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对社会史研究应如何坚持学术标准有着正确的认知。张资平以“专写三角恋爱与性”而闻名沪上,因其“懂得大众”,知道大众“需要什么”,在迎合“大众”方面“比提倡大众文艺的郁达夫似乎还高明”,其作品“所赢得的大众,比鲁迅作品还多”。忻平指出,在上海,庸俗文人何止张资平一人,黄色文化也不限于小说。这种现象,是文学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附产物,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作家创作自由与地位独立的表征,“却也显示出市场经济覆盖了文化领域之后所驱动的‘媚俗’导向,由此带来了文化的不幸与危机”。忻平借用沈从文这位真正能代表近代上海文化主流的作家的批评言论说:张资平们的作品,“造了一个卑下的低级的趣味标准”,是在引导市民朝着“本能的向下发泄的兴味”方向发展。这种既包括张资平如何迎合“大众”,同时包括沈从文如何批评“媚俗”的“全息”写法,不仅大大提高了忻平著

作的学术品位,而且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日趋成熟,也将起到良好的示范与促进作用。

欲作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需要积累丰富的文献资料,亦须大量的专门性探讨作为铺垫。忻平过去几年的研究成果表明,他为从事该项研究所作的前期准备是很充分的。在资料方面,亦能做到左右采获,上下罗致,其著作不仅使用了大量被钱穆称为研究社会史“首选材料”的方志,而且发掘了许多重要的档案史料。例如在分析30年代上海人口及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精神疾患、自杀、离婚以及盗窃、杀人、帮会活动等社会现象时,便利用了上海市档案馆所藏“上海市公安局档案”等反映事实真相的珍贵卷宗。本文前面所引上海近代移民的数据,就是忻平从上海公安局档案中整理出来的,它不仅包括上海近代全部居民数,而且按籍贯对居民做了详细分类,每个省的人数均落实到个位,十分精确。以1936年的数据为例,在总数为2144330居民中,“土著”上海居民只有514486人,占全部居民数的23.99%。忻平称上海是一个“移民为主体”的城市,结论虽不新颖,但立论的依据却远比一般泛论所本更加接近历史原貌。其著作显得饱满充实,具有可信度,此实重要原因。

不过,从技术层面看,忻平的著作也留下了某些思虑欠周的痕迹。也许是由于过分强调“全息”,少许不必在一本标识为“社会史”的著作中出现的历史影像也被摄取进来。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东西文化之争”以及30年代因“本位文化建设”而引起的论争,虽然以上海为“主战场”,但严格分类,应属思想史或文化史的研究范围,非忻平著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将这些论争引入,势必冲淡“社会史”的意味,给人以旁逸斜出之感。然而此失尚不为大。要紧的是,一本学术著作的容量终归是有限的,无关的东西进来了,留给相关东西的位置就会缩小。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无可争议地应当划归“社会史”研究范围的问题,如妇女、婚姻与家庭等,却未置诸论列;有些业已提出但还可深入探讨的问题,如黑道及“社会三乌”等,却因“篇幅限制”而言犹未尽。但愿作者呈献给我们的,只是他研究系列中的一部分。到了新的作品接踵问世,与这本已经付梓的著作合成“完璧”之时,我们这种多少带有期望色彩的批评就将失去价值。

注释:

- ① 忻平著《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46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② 观其所著《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条约口岸的开放》(J.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53),学者自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参考文献:

- [1] 忻平. 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 申报(增刊),1933-02-05.  
[3] 张开敏. 上海人口迁移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4] 黄苇,等. 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5]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钱穆.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 长沙:岳麓书社,1986.

## Cognition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of Social History of Treaty Port

YANG Tian-hong

(History Department,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Cong Shanghai Faxian Lishi* by Xin Ping, responding to Cohen's idea of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nd at the same time borrowing from Yu Yingshi's exposition of the trend of "going into the society" that exists in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corresponds with commodity economy and the theory of Confucianism transformation, holds that it is the "gene"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at helps it fit modernization and it is intrinsic impetus of Shanghai's modernization as well. However, the author's argument that Shanghai is basically an migrant city and the migration reflects to a large extent their devi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ideas does not support the theory.

**Key words:** Xin Ping; Shanghai; social history; perspective

[责任编辑:凌兴珍]